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张洪波

《红楼梦》“远嫁悲情”的跨文化省思*

摘要：探春远嫁后的命运走向是“悲”是“喜”？红学界在此大判断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本文认为这一分歧根源于《红楼梦》文本复杂意蕴中批判性与保守性因素的错杂交叠；本文从作品文本细读入手，将悲喜两方面线索逐一梳理展开，并对其中的意义冲突与思想分歧进行综合辨析与跨文化省思，继而指出，《红楼梦》虽已清晰表达出对封建文化“末世”的不满与绝望；但“远嫁悲情”的抒写，却又透露出曹雪芹潜意识中的“安土重迁”观与“华夏中心”观，这严重限制了他对于“远方异域”的认知和想象。

关键词：《红楼梦》 远嫁悲情 跨文化省思

《红楼梦》贾府四姊妹中，作者着墨最多、形象最为出彩的，是三姑娘探春。“俊眼修眉，顾盼神飞”的她，一出场便以文彩精华、清新脱俗的形象于诸姐妹中脱颖而出；在《红楼梦》万马齐喑、江河日下的“末世”氛围中，“敏探春兴利除宿弊”一回，是难得的一抹振奋人心的亮色，脂批赞探春“看得透、拿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是有才干者，故赠以‘敏’字”^①。才干超群、不同凡响的探春，将来的命运走向如何？小说第5回中，预示探春命运的判词册页是这样描绘的：

……两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

*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3JDWYB009 的阶段性成果。

① 戚序本第56回回末总评。



泣涕之状。也有四句写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

从中可知，才华超群、志向高远的探春，在黑暗腐朽的封建末世毫无用武之地，只能于凄婉的清明时节，与亲人泣别，登舟远嫁，如断线风筝一般，去往远隔数千里、音讯难通的海外他乡。

此外，小说第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探春所抽花名签为“日边红杏倚云栽”之“瑶池仙品”，注明“必得贵婿”，同样具有强烈的命运暗示意味，以“瑶池”之远，“倚云”之高，及众人随口而生“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之玩笑语，又一次预埋下探春远嫁为王妃的命运线索。

总之，《红楼梦》前80回雪芹原著为探春日后的命运走向给出了如上耐人寻味的暗示性线索，描绘出“远嫁为妃”的大致轮廓，但尚未来得及具体铺写与细致展开，这就为小说后40回续书及《红楼梦》研究者留下了待完成的命题，打开了想象与探佚的空间——探春因何远嫁、何年远嫁、嫁至何处、嫁与何人？这一系列引人遐思的远嫁探佚细节，久为红学界所热议，众说纷纭，异彩纷呈^①。其中笔者发现，红学界在“探春远嫁”话题领域所存在的最为关键和根本的分歧，其实不在有关远嫁之“因何、何年、何地、何人”等诸多细节方面的差异，而在探春远嫁以后的生活遭际是“幸福”还是“薄命”这样两种截然对立的基础性判断上。

程高本后40回续书中，写探春由贾政做主，嫁给镇海总制周琼之

^① 参阅郑琦、王人恩：《20世纪探春形象研究述评》，《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3期，第91—99页。

子，虽相隔遥远，但是门当户对，才貌相配，不失为一桩好亲事^①，后来探春回贾府省亲，“众人远远接着，见探春出挑得比先前更好了，服采鲜明”^②，表明探春远嫁之后生活幸福，且能荣归故里；1920年发表的佩之《红楼梦新评》亦认为：“探春在三春之中，最精细，最能干，最有思想。从前的人，都以他的远嫁为福薄。其实他是诸人中，结果最好的一个”^③；王昆仑在《政治风度的探春》（1944年发表于《现代妇女》杂志）中认为探春远嫁海疆为妃，“比起元春、迎春、惜春以及湘云、宝钗等，作者还是给探春以较好的结局”^④；其后胡成仁在《论探春——大观园中的女政客》（1947）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只有她，具政治家风度的探春，她幸福的远嫁，……是‘哭’与‘悲’下的一颗明星，是曹雪芹希望的路。”^⑤

1980年，梁归智发表颇有影响的论文《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对《红楼梦》作品文本中与探春相关的线索进行了细致而系统的梳理与考论，最后指出：“探春的结局应该是嫁到中国以外的海岛小国去做王妃”，“这正反映了曹雪芹对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彻底的绝望。可是他又不能毫无希望，于是幻想出了一个海外的‘桃花源’，把探春打发去了。”^⑥

以上观点都认为，探春远嫁后的生活寄托着某种希望之光、包含着获得幸福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则有更多红学家对类似于后40回

-
- ① 《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9回，贾政看了镇海总制为儿子求婚的书信，心想：“儿女姻缘，果然有一定的。旧年因见他就了京职，又是同乡的人，素来相好，又见那孩子长得好，在席间原提起这件事。因未说定，也没有与她们说起。后来他调了海疆，大家也不说了。不料我今升任至此，他写书来问。我看起来门户却也相当，与探春倒也相配。”可见这不失为一门好亲事。
- ② 《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回。
- ③ 原文载于1920年上海《小说月报》第11卷第6、7号，转引自《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册，第58页。
- ④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80页。
- ⑤ 胡成仁：《论探春——大观园中的女政客》，原载于上海《大公报》1947年5月14、16日，转引自《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下册，第1147页。
- ⑥ 梁归智：《石头记探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28页。

续书中这种较为幸运的远嫁方案表示不满，如俞平伯即直接指出“这样的写法，并没有什么薄命可言”^①；张庆善认为，梁归智所言探春嫁往海外“桃花源”的结局未免“太过幸运了”，有违“薄命”之原意设定，他推测探春即使远嫁后得贵婿、做王妃，但“生活肯定好不了”，一定会突遭变故而“落魄”，“最终还是逃脱不掉‘薄命’的结局”。许多学者皆认为探春的结局绝不会是“得以新生”，必须符合“薄命”之设定，至于“薄命”之具体情形，则说法不一，或是夫家突遭巨变，或是遭遇“海盗”，或是自寻短见，或是婚姻不幸、夫妻反目，或是非议获罪，或是惨遭流放……总之，探春在远嫁之后不久应即香消命殒，再也未能回到故土。^②

探春远嫁之后，其命运走向究竟是悲是喜，是祸是福？红学界各执一端的判断，皆能从《红楼梦》作品文本中找到线索与依据。下面，本文拟将两个方面的文本线索逐一展开，再就其中的意义冲突与思想分歧进行综合辨析与整体省思。

探春远嫁后“薄命”之说，在《红楼梦》中的确拥有强大的文本依据与逻辑合理性。

首先，预示探春终身命运的判词册页，本就属于小说第5回太虚幻境“薄命司”中“金陵十二钗正册”的一部分，同时亦与《红楼梦》“千红一哭（窟）”、“万艳同悲（杯）”的整体悲剧性氛围协调一致，而贾府四姊妹“元”、“迎”、“探”、“惜”之名字，也已暗喻其“原应叹息”的整体悲剧命运；

其次，小说前80回预示探春远嫁命运的具体文字描写之中，的确处处流露出一种真切而深浓的“远嫁悲情”：

1. 探春判词头两句“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极精炼地概括了探春才高志远而生不逢时之运势，发“末世衰运”之悲叹；

①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9页。

② 参阅郑琦、王人恩：《20世纪探春形象研究述评》，《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3期，第91—99页。

而后两句“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显然是依依泣别，一去不返，音讯渺茫，其意境无限凄婉而惆怅；

2. 与判词相呼应的《红楼梦曲·分骨肉》一支，进一步如泣如诉地抒发了因遥遥远嫁（“一帆风雨路三千”）、骨肉分离、背井离乡（“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而强忍悲戚、强自宽解的牵挂与不舍（“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以及天各一方的无奈与悲凉（“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3. 小说中还巧借“风筝”意象，处处点染和强化探春远嫁之离愁与感伤：第5回判词册页中的两人放风筝之图景，已暗喻“高飞远别、骨肉分离”；第22回探春所制风筝灯谜，词曰“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妆点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再次预示其清明时节的远嫁，一如“断线风筝”般漂浮无根，充满着离愁别恨；第70回中写姐妹们一起于春日放风筝，独有探春的凤凰风筝与不知谁家另一凤凰风筝及“喜”字风筝绞在一处，“谁知线都断了，那三个风筝飘飘摇摇都去了”，又一次以“断线风筝”意象之重叠及“凤凰”细节之增补，更强烈地暗喻探春远嫁为妃，飘摇海外的命运；不仅如此，第70回中另写探春吟咏柳絮所作的半阕《南柯子》词“空挂纤纤絮，徒垂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以缠绵凄恻、离散飘零的“柳絮”意象，从另一侧面渲染强化了无限的远嫁悲情。

仔细辨析起来，以上所述探春远嫁之悲情文字，其中仅有探春判词头两句“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是针对探春本人而发的怀才不遇的“末世衰运”之叹，感慨她才高志远，却生逢“末世”，全无用武之地，只能无奈地远嫁他乡；而其他文字部分，几乎皆聚焦于抒发因遥遥远嫁而生的“离乡去国”、“骨肉分离”之悲。此种悲情抒写中，渗透着中国历代和亲文学的深远影响。在中国和亲文学史中，“昭君出塞”的文学母题影响最为深广，《红楼梦》第64回林黛玉所作《明妃》诗“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薄命古今同”，便是对“昭君怨”

悲情主题的直接承继。“红颜薄命古今同”之浩叹，使人很自然地将“探春远嫁”之悲情与“昭君出塞”之悲怨联系起来等同看待，因而远嫁“薄命”之说，在“昭君怨”的历史语境下，似乎颇显得顺理成章；然而，古今时代已然不同，从汉代到清代，世易时移，贾探春之远嫁，距昭君出塞时的历史语境已发生极大变迁——此时封建传统文化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末世”；而曾被视为“蛮夷”、“化外”的“远方异域”，至18世纪中晚期已于日新月异中改换了面貌；中国社会巨变的风雷，正隐隐酝酿于天际。探春于本土“末世”远嫁至异域，或许不止是无奈的分离，而可能遭遇新生的契机？

通观《红楼梦》中表达远嫁悲情的文字，除初发“末世”之叹、继而大抒“远离”之悲外，并未出现有关探春远嫁之后是否“薄命而亡”的直接或间接的暗示；而与此同时，作品中却另借“花名签”及“凤凰风筝”两处，一再预示探春将远嫁为“王妃”——这表明探春远嫁之后拥有较高身份地位，这将为她在夫家的生存提供有利条件；以王妃身份远嫁之后，既然是“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那么，以探春本人阔朗的胸襟，不凡的见识，超群的才干，她此后的生活，未必没有“保平安”、获幸福的可能——“幸福远嫁”之说，便由此而生。

的确，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探春本人——《红楼梦》作者以珍惜、激赏的笔墨精心描绘出的这朵“才自精明志自高”的“带刺的玫瑰”——就不难发现，“远嫁平安幸福”之可能，是由于这位见识过人、才干超群的“三姑娘”以坚毅明敏、奋发有为、勇于改革开拓的性情底色，为把握自己的未来，提供了强有力的背书。

探春是贾府中的庶出小姐，虽有母如赵姨娘之阴微鄙贱，有弟如贾环之猥琐卑劣，她却活出了自己的高贵、独立和精彩，从未屈服于不公正的身份和命运；她心胸阔朗，格调高雅，律己甚严，为人极有分寸；在贾府整个暗浊、腐朽、没落的末世氛围之中，她兴利除弊、除旧布新的改革，她痛陈家族之弊的净言，她对抄检侮辱的奋起反击，成为了振奋人心的唯一“亮色”。多愁善感、顾影自怜、凄凄惨惨戚戚、

“游丝一断浑无力”的弱女子形象，显然不符合探春本人的性格主调。探春自尊自强，精明果断，有胆有识，敢做敢当，有男子气概，更有强者气质。她的身上，寄托着《红楼梦》的希望之光——脂砚斋曾感叹：“使此人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致流散也，悲哉伤哉！”^①

分析至此，不难发现，现实生活中积极有为的“探”春，与远嫁预言中那个多愁善感的“叹”春，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而进一步辨析起来，这种巨大反差不仅体现在形象气质方面，更体现在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中：

其一，现实中的探春，对大家族内“自杀自灭”、“骨肉相残”的丑恶现实其实充满了厌恶和不满。小说第71回中她曾感慨：“我们这样人家人多，外头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小姐，何等快乐，殊不知我们这里说不出的烦难，更利害”；第75回抄检大观园之时，她更沉痛而悲愤地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由此看来，对家族亲人之间“窝里斗”的丑恶现实与冷漠亲情有着如此深刻洞察的探春，理性、清醒而果决的探春，远嫁之时对于“骨肉分离”，真有可能产生那么强烈而缠绵的依恋、不舍和牵连吗？

其二，现实中的探春才高志远，抱负不凡，却深受“男尊女卑”、“嫡尊庶卑”等封建文化观念的压抑和束缚，深受“老鸹窝”里赵姨娘和贾环的折磨和拖累，第55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的尴尬屈辱情境中，她不禁流着泪说：“我但凡是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由此看来，深感怀才不遇，行动处处掣肘，在家族礼教束缚中永无用武之地的探春，一旦远嫁为妃，终于能够“出得

^① 《红楼梦》第22回脂批。

去”了，此时她是渴望远走高飞、大展拳脚去“立一番事业”，还只是一味涕泪涟涟、不忍离开这如此压抑束缚着她的“家园”呢？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当探春远嫁时真正面临“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的那一刻，其心中也会油然而生离情别绪，也难免会有“掩面泣涕”之时，此乃人之常情；但当久已渴望的摆脱束缚、远走高飞、施展抱负的“远嫁”契机终于到来，探春心中除一时的离愁之外，是否会有更多“走向新天地”的释然、欣喜与期待？若本地之“末世”既已如此衰朽至极，而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那么，当探春走出这一“铁屋”，摆脱封建文化“男尊女卑”、“嫡尊庶卑”的沉重束缚，远嫁他乡，得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语），那么充满希望的新生活、新世界的到来，岂非更在情理之中？

行文至此，不妨进一步追问：前文中因探春遥遥远嫁而生的“离乡去国”、“骨肉分离”之悲情，究竟主要是“谁”之悲情？是探春个人之悲情，还是父母、亲人、家族痛失好女儿之悲情？或更是《红楼梦》作者本人将家国痛失英才之悲情，转嫁为探春之“离恨”？（一如历代由男子代作悲音的闺怨体诗歌？）——其中，恐怕真正发自探春个人的悲情有限，而发自家国与作者的悲情却无尽吧！

梁归智曾指出：“在探春的身上，深深地凝聚着曹雪芹既绝望又希望、既决绝又不舍的思想感情。”^①《红楼梦》表面上描写的是每个人的各人命运，实则是对整个民族文化命运的暗喻。探春远嫁之后，其命运走向如何思考和判断的问题，所牵涉的不仅仅是其个人命运之悲喜祸福的问题，更是民族文化之命运前景如何的大判断。

曹雪芹《红楼梦》以“红颜薄命”、“万艳同悲”的整体性悲剧氛围，揭示、批判和控诉了扼杀一切美好青春生命的封建文化之没落、黑暗、腐朽和绝望。小说结尾处描写宝玉最终“出家”，是以全书主人公决绝抛弃骨肉家园的断舍离姿态，明确表达了小说作者本人厌恶、

^① 梁归智：《石头记探佚》，第28页。

批判、弃绝这腐朽压抑的封建贵族文化的立场——质言之，《红楼梦》已清晰表达出对“本地生活”之批判与绝望；但遗憾的是，《红楼梦》对探春“远嫁悲情”的抒写，却又透露出作者曹雪芹潜意识中“安土重迁”的文化保守观念的强大思维惯性，它使作者尚未能完全摆脱固有的“家园依恋”与“骨肉分离”悲情；贾宝玉的出家、绝望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迷茫，与作者曹雪芹之“家园依恋”情结互为表里——因为“安土重迁”、“家园依恋”情结的另一面即表现为“变迁恐惧”和“远方畏途”心理——虽然本土已是“末世”，而希望却仍无可能出现在远方——贾宝玉和曹雪芹之所以看不到出路，是因为他们下意识中拒绝和排斥了“远方”——此“远方”已被先天标注为“蛮夷之地”，“化外之民”，何足以道！在对远方异域、陌生他者的贬抑、排斥与无知的背后，潜藏着悠久而顽固的“华夏中心”与“夷夏大防”之文化观念所造成的“文化自大”与“文化自闭”的保守落后心理。

红楼群钗之中，当属曾随父亲远游四方的薛宝琴见识最广，小说第52回中，宝琴描绘她曾见过一位“外国美人”

“我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戴的都是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带着倭刀，也是镶金嵌宝的，实在画儿上的也没她好看。有人说她通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作诗填词，因此我父亲央烦了一位通事官，烦她写了一张字，就写的是她作的诗。……记得是一首五言律，外国的女子，也就难为她了。”

据宝琴的转述，那位真真国美女所作五言律诗如下：

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



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

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

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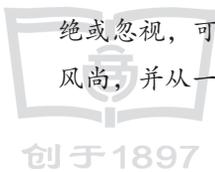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这便是《红楼梦》中唯一的远方异域想象——外国美女“通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作诗填词”，她创作的五言律诗“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这种“率土之滨，莫非‘诗人’”的天真美好幻想，折射出的是《红楼梦》作者“中央大国”的文化自大心理与封闭保守的文化向心思维，它牢牢限制和束缚了清代文学天才曹雪芹对于“远方”和“异域”的认知和想象。

事实上，早在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代之前，“远方异域”的文化使者便已抵达中国本土——早在明代，西洋传教士就已陆续进入中国，1607年，利玛窦就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等科学著作——可惜明清统治者及绝大部分国民，包括《红楼梦》作者和他的小说人物，在取用西洋的精致“器物”之时，却选择性地无视和忽略了西洋文化中的其他一切。有研究指出：

在清前中期的显贵之家，“洋货”已和中国传统的绸缎同样具有了“家常应用之物”的地位，……而在（《红楼梦》中）连女孩子们都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诗礼簪缨之族”，科学方面的外来词一个也不曾出现，书中所描绘的清朝显贵阶层，还依然沉浸在传统文化、仕途经济之中，做官的做官，作诗的作诗，在享用着西方先进物质文明所带来的奢侈品时，并无一人去关心西方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已怎样威胁着这个“天朝大国”。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红楼梦》）那个时代的贵族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接受了什么，拒绝或忽视了什么。这种拒绝或忽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个时代贵族阶层耽于享乐的时代风尚，并从一个侧面窥见百年后中国被迫进入痛苦的现代史的症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創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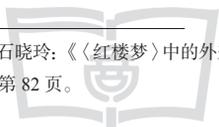
在对“海疆”之外的“远方”与“异域”的认知和想象上，《红楼梦》的天才作者曹雪芹及其续作者们仍未能摆脱时代文化之局限，未能走出“华夏中心”的桎梏，认真面对并主动走向“远方”。

不过，《红楼梦》在探春精彩人格形象塑造中所寄托的希望之光，以及探春“远嫁为妃”的想象，仍不失为曹雪芹于《红楼梦》整体悲剧氛围笼罩下网开一面的神来之笔。有关探春远嫁之后“悲喜难料”、“祸福未定”的开放性结局，隐含着作者对于家族与民族之未来命运走向的有限而可贵的探索——在判定红楼诸钗命运之时，选择让拥有独立精彩之个性、勇于创新之魄力与精敏强干之能力的探春走向陌生的远方，这足以令当时乃至今日的读者，心怀“反抗绝望”的信心与力量，来展望未来的曙光。

探春身上不仅寄寓着贾府的希望，更寄寓着民族的希望。她的精敏果断，奋发有为，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民族传统文化中积极昂扬的生命活力；对她能否走出“铁屋”、走向远方、“别求新声于异邦”、去开拓和创建更美好生活的追问，与对民族传统文化能否激扬其生命活力、能否更新认识框架、能否重新认知远方异域等系列命题的省思和追问，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在跨文化的当代语境下，对探春之远嫁进行开放性、创新性的省思，或许可为我们走出红楼，走向远方，走向世界；同时亦走出传统，走向现代，打开一种富于启示意义的新思路。

① 石晓玲：《〈红楼梦〉中的外来词与外来文化》，《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3期，第82页。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